

社会主义的昌建设



一户贫农的仇恨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一户贫农的仇恨

韓基良 讲 百 合 記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964年·杭州

插图：何巧玲

封面设计：朱子容

一户贫农的仇恨

韩基良 讲 百合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5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 1/9 字数10,000

1961年11月第一版 1965年1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110,000

统一书号：T3103·380 定价：(5) 七分

我叫韓基良，三歲上就失去爸媽，離開阿哥和阿姐。在舊社會里，苦難的生活逼迫着我，使我一直不曉得自己的身世。到了一九五七年，經過多次打聽和托人訪問，才知道我有一個哥哥，叫趙長明，住在王店公社東六生產隊。這一天，正好是休息日，我趁火車到了王店鎮上的一份親戚家，渴望着和哥哥見面。等了不多久，忽見門口進了一個農民打扮的中年人，長方臉，闊嘴巴，面貌和我很相象。不用說，這個朴實的“陌生”人就是我的親哥哥了。我激動地上前叫了聲：“阿哥！”我們認定了兄弟後，當我問起家裡還有哪些人，爸媽為什麼從小將我送給人家時，好象一扎扎鋼針，刺痛了大哥的心。他剎時淚水滾滾，用十分激憤的聲調，源源本本給我講了一段血淚史。

借高利破产逃荒

大哥告诉我說，我家祖祖輩輩都是受苦人。阿爹临死前，被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榨得只剩下两間破草棚，两亩瘦沙地。他老人家快要断气的时候，还伸着两个指头，交代我阿爸：两亩沙地，是一家人的命根子。死活也要守住这两亩地。

阿爸是个一等好劳力。那辰光，他正当年轻力壮，肩上挑着一二百斤重担，还是跑得飞快。可是因为我家无田少地，他浑身力气无处用。两亩沙地上种点棉花，也卖不到几个钱，养不活一家大小五口。有时候，他只好给人家去打打短工，量升把米来，熬口汤吃吃。

旧社会，穷人家連这样的苦日子也混不下

去。有一年，一場大水；把我家的兩畝棉花泡了湯。阿爸不忍心看着一家人活活餓死，只得口湯喝鹽鹵，借了地主兩石高利米。地主的心腸真狠毒。兩石高利米滾到下一年秋天，連本加利就是三石。阿爸還不起，到了第三年，就滾到了四石半。這樣利上滾利，真象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。一家人熬吃熬穿，還是付不清當年的利息。挨到一九三〇年冬天，這兩石米竟滾到了二十多担，折合一百多塊大洋。這時，阿爸因為勞累過度，得了肺癆病。他背着這身重債，急得象熱石頭上的螞蟥一樣。想來想去，想想自己在家乡已被地主階級逼得走投無路，一家人生路斷絕，坐在家里等死，倒不如把兩間破草棚和兩畝沙地賣了，還掉債務，到“下三府”（指杭嘉湖一帶）去闖闖看。傳說那里田土肥沃，說不定還能撈到口白米飯吃。

一天，阿爸趁着一家人都在面前，把這個主意跟媽媽說了。媽開始還不愿意離開這個窮家，

不相信到了那边会有白米饭吃。当她看到骨瘦如柴的阿哥阿姐都喊肚皮饿，吵着要饭吃，终于把心一横，答应了阿爸。

主意定了，阿爸忍痛将两亩沙地和一些家用东西统统卖了，凑足钱还了债。自己和妈妈只随身带了一床破棉絮，几把锄头、铁镢，拖男带女，离别了家乡。

这天，大雪方停，寒风刺骨。一家人穿的都是单薄的破衣裳，冻得牙齿“格格”响。肚皮饿



爸媽拖男帶女，離別了家鄉。

了，只能啃点隨身帶來的糠餅。一路上吃了很多苦頭，好容易到了王店鎮西鄉，找到了遠房堂姑夫陳阿興。

姑夫聽到阿爸是想到嘉興找活路的，一時沒了主意。他安頓爸媽暫且住下之後，就對阿爸說：“你也太冒失了，事先怎不寫封信來商量商量？”他指指自家那所破破爛爛的草棚說：“你看我這副光景，‘下三府’的窮人，還不是和家鄉的窮人一樣苦！”

阿爸聽了姑夫這些話，知道天下地主都是一路貨。東山老虎要吃人，西山老虎也要吃人。

“下三府”的窮人照樣沒有活路。可是他轉念一想：覺得反正在紹興也是活不下安，既已到了這裡，明知前面是刀山火海，也只得硬著頭皮闖一闖。

种租田受尽煎熬

阿爸人生地不熟，連租田也租不到半分。隔了几天，堂姑夫領着阿爸，跑到王店鎮地主姚貴珍家里，要求租几亩田种种。

姚貴珍一脸横肉，斜着毒蛇眼睛打量了一下阿爸，皮笑肉不笑地說道：“看你客帮人来得可怜，我有心照顾你，現在还有塘北开春桥边一票田，总共三十亩，每亩板租七斗半白米，你要租就馬上一道租了去。否則，別人也在等着写租契。”

阿爸听說地主有三十亩田要一块出租，只是耽心自己赤手空拳，种不熟田稻。可是他想，現在已是年脚边，要租到田实在不容易。种不到田，一家人只能餓死在客地了。他搔搔头皮，只

得答应了下来。

姚貴珍見阿爸中了計，馬上叫管帳的寫租契，寫明：“每畝板租七斗半白米，不論水旱荒歉，顆粒不得短少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存照。”管帳的寫好了契，還要阿爸在上面圖上押，蓋上羅印。這三十畝田算租定了。

誰知地主租給阿爸的是一方水路很遠的“圩心田”，土質又是“板結土”，黃登登，硬綑綑，毫無一絲活力。等到阿爸他們尋着這方田看了看，才曉得中了地主的圈套，又氣又恨，眼睛里要冒出火來。阿爸本想跑去跟地主說理。姑夫却一把攔住了他，說：“地主勢大不講理，現在租契已經寫定了，你一個人去和他斗，一定要吃眼前虧！”阿爸听了姑夫的勸告，只得在田邊搭了個草棚，把一家人安頓下來。

轉眼間，春耕開始了。可是阿爸赤手空拳，實在忙不轉來。他只得起早落夜拼命干。這年大哥長明還只有十一歲，也幫着插秧、耘田、拔

草，做种种杂活。夜晚趁着星光，阿爸还得帶着大哥在田里干上一陣。我是在这一年夏天出生的。媽媽产前产后，要打发一家人吃的，有时还得下田幫着干活。五荒六月，家里无米下鍋，媽媽生我不久，只得帶着阿姐下河摸河蚌，弄回来用清水煮煮当飯吃。这种沒有油鹽的河蚌，聞着就使人噁心。一家人常常吃得“嘩嘩”呕吐。阿哥阿姐竟吐得直冒黃水。

种田下不起农本，种的是“苦命稻”（一种省肥、早熟的中稻）。因为田瘦肥缺，禾苗总是腊黃腊黃，发不起来。亏得一家人辛勤耕作，加上这一年风雨調匀，稻头漸漸由青变黃。这些稻谷是我們一家人用血汗浇灌大的，一粒稻谷一滴血哪！一家人看着这一片黃灿灿的稻谷，面孔上难得有了笑容。阿姐高兴得連睡梦里也在笑嚷：

“有白米飯吃啦！”

可是，正当我們一家人在最后一块田畝里割稻、攢稻的时候，地主的收租船却在我家門前的

河浜里停了下来。收租的帶着一班人走到我家草棚門口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就要阿爸弄酒飯來吃。等他們吃得酒醉飯飽，帶頭的狗腿子便喝令手下人把稻穀搗得一干二淨。然後他站起身來，隨手抓起一把來看看，放幾粒到嘴里“格格”咬了咬，板着臉說道：“這谷太潮，要打九折算帳。”阿爸急了，忙說：“這谷子已經晒過三四個太陽，咬都咬得響了，怎麼還說潮？”狗腿子又凶狠地喝道：“廢話！這是我們老太爺定下



“不讓這些黑心賊爺呀！不讓這些黑心賊爺呀！”

的規矩！”說罷，指揮手下人拿起帶來的加一老斗，滿斗滿斗地量起來，就和強盜搶差不多。

他們量啊量，裝啊裝，足足裝了五十多麻袋，滿滿疊了一船。阿哥阿姐眼看屋里、場上的許多谷，快要給舂光了，急得撲在媽懷里，哭鬧着說：

“不讓這些黑心賊舂呀！不讓這些黑心賊舂呀！我們自家沒有白米飯吃了呀……”阿哥阿姐哭，媽媽也哭。阿爸恨極了，牙齒咬得“格格”响。但是，在這種黑暗的世道里，刀把子捏在地主手里，窮人有苦沒處訴，有理沒處講。他只得背地里狠狠地罵道：“這樣強凶霸道，總有一天要完蛋！”

咳！農民種租田，是竹籃打水一場空，到頭來還是喂肥了地主，餓瘦了佃戶。這一年年腳邊，阿爸算算帳，總共收起三十六石米；三十畝田的租米，按照租契要交二十二石五斗，可是實際上被地主拿走了二十七石多；自己無牛無犁，只好央求富農包耕，總共要付出包耕費三石；再還過債利米，就去了十之八九。一家人做死做

活，做到头来，还是吃不到几颗米。

阿爸逃荒到“下三府”以后，就在这样的苦日子里滚过了三个年头。第三年下半年，阿爸的痨病越拖越重，大口大口地吐血，做不动生活。秋后，收起的粮食，只够交租米。地主姚贵珍见阿爸已经精疲力尽地把荒田垦熟，可以提高租额，在别的佃户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了，就用强迫手段把田抽了回去。

阿爸在开春桥蹲不下去了，全家就流落到延安桥。因为无本少力，连租田也不容易租到。后来出了重租，总算向一个姓潘的地主租了五亩田。

这一年，正是杭嘉湖地区的一个特大旱灾年。从种田时节开始，整整一百几十天，滴雨不下。火球似的太阳，晒得大地冒烟。阿爸种的五亩田，座落在死浜底头。初旱时还有一路浅水，一家人没日没夜地踏车，眼睛熬红，脚底起泡。后来水干浜断，河底朝天，苗枯叶焦，成了一蓬蓬干草。阿爸呆呆地站在田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做雇工家破人亡

这一切被地主沈国良看在眼里。沈国良是当地一霸。他杀人不見血，却有一副好騙功。他雇工耕种的五十多亩水田，虽然全在大河边，但在这种大旱年成，也缺少人工車水。就趁阿爸危难辰光，跑来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赵阿龙，我看你这几亩稻苗已经无救，急死了也无益。你们父子两个，倒不如到我家去帮帮忙，秋后给你两担米，一家大小也好度荒。”虽然阿爸明知他是猫哭老鼠假慈悲，但想到眼前别无去路，只得点头答应了他。

沈国良把河爸、大哥騙进门后，就露出了吃人的真相。他分派阿爸看管車盘，不分昼夜地替他車水。阿爸的身体本来已经很衰弱，那里經得

起这样的折磨，不久便发起“四日两头”寒热病来。每天只喝几口薄粥湯。他实在支撑不住，要沈国良让他歇几天。沈国良“嘿嘿”冷笑一声，說：“哼，要紧关子攢鑼柱，耽誤了給老子車水，看不要了你的狗命！”說着，手一甩，“登登登”走掉了。阿爸心里恨极了，但他为了要拿两担工錢米，只得掙扎着受煎熬。

这一年，地里干得象沙漠，草都枯死了。沈国良要大哥給他割草喂牛。大哥夜里困在牛棚角落里，一到后半夜，就得爬起来背着草筲出門割草。要喂飽几头牛实在不容易。有时候，他东寻西找，来回奔跑了十来里路，才割得一浅筲草，不够一只牛吃一頓。他小小年紀，劳累过度，吃的又是餓粥剩飯，不久就得了“黄胖病”，眼球腊黄，肚皮发胀，四肢无力。一天，他拖着双脚去割草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一陣头晕，連人帶筲跌在地上。过了一歇，沈国良从王店鎮上吃罢老酒回来。一見阿哥躺着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近折了

根竹梢，夹头夹脑狠狠抽打起来。他边打边骂：

“小杂种，倒会享福，饿坏了老子的牛，用你抵命还不够本！”打啊打，打得阿哥身上青一条、紫一条，然后逼着他又去割草。

阿爸、大哥和另外几个穷兄弟，用血泪救活了地主的大片禾苗。到了九月重阳边，周围许多农民都颗粒无收，只有沈国良等地主的田里，稻头密密沉沉，一片金黄。

一天，沈国良把阿爸叫到面前，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这一晌，你辛苦啦，也该回家去歇歇了。长明嘛，让他再留几天割割草。”这个地主嘴里芝麻白糖，心里毒药砒霜。阿爸晓得沈国良现在已经用不着他，要把他推出门去了，便说：

“好吧，走就走。你给我那两担工钱米，好让我回去养家活口。”沈国良一听阿爸向他讨工钱，就翻转面孔冷笑一声说：“嘿，工钱米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这么个病鬼，白白吃了我几个月饭，不和你算饭钱，已经够交情的了，还